

二十一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孩童形象

吴如萍

北京果园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 100053

DOI:10.61369/HASS.2025070034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政策支持与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合力推动下，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电影的生产规模与类型形态稳步拓展，并逐步形成与市场机制相匹配的创作格局。该类型以儿童视角为叙事枢纽，将家庭伦理、宗教实践与地方性知识汇入具体而微的影像场景，凭借在地化美学与民族风格，持续拓展中国电影的历史书写与地域表达。系统梳理此类作品的影像策略与文化功能，有助于揭示当代民族影像的再生产机制及其在跨族群交流中的作用，也为以儿童为中心的人类学讨论提供可检验的文本样本。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孩童形象

The Image of Children in Chinese Minority-themed Films in the 21st Century

Wu Ruping

Beijing Guoyuan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Co., Ltd., Beijing 100053

Abstract :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under the joint impetus of policy support and the process of film industrialization, the production scale and genre forms of minority children-themed films have steadily expanded, and a creative pattern that matches the market mechanism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This genre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as the narrative hub, integrating family ethics,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local knowledge into specific and detailed visual scenes. With its localized aesthetics and ethnic styles, it continuously expands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region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films.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visual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such works helps to reveal the reproduction mechanism of contemporary ethnic images and their role in cross-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also provides verifiable textual samples for anthropological discussions centered on children.

Keywords : 21st century; Chinese minorities; films; children's images

一、儿童形象的文化位置与人类学意义

性引导者。

(一) 儿童作为文化观察者与传承者的双重身份

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儿童常被置于成人世界的边缘地带，却承担着文化透视与价值继承的双重功能。他们以不加修饰的观察力穿行于宗教仪式、家庭伦理和日常劳作之中，其言行虽稚嫩，却构成族群知识与信仰体系的实践片段。影像以儿童为中心，激活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再审视，也在代际互动中揭示文化延续的微妙逻辑。这类角色并非等待塑造的“空白容器”，而是现实秩序下的敏感感知者，其童年经验往往藏有文化转型的前奏，提醒观者正处于深刻变迁的历史节点^[1]。

(二) 电影中的“童年”建构

“童年”在少数民族影像中往往被赋予高度文化意味，其纯真特质成为导演介入社会议题的重要媒介。孩子的目光绕过制度语言，直抵家庭裂痕、信仰动摇或生态失序的深层痛点。在影像构建中，童年不是原生态的记录，而是一种情感与象征高度重视的艺术想象。以王丽娜的作品为例，孩童的沉默、责任与悲悯常呈现出超越年龄的文化负载，使其成为民族社会转型中的“微缩景观”。童年的构造在此不仅具备叙事功能，更扮演文化自省的隐

(三) 少数民族儿童影像的常见叙事母题

近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儿童角色频繁承担四类叙事重心：一是游离于亲缘体系的“寻找者”，映射身份断裂与家庭缺席；二是被卷入城市化洪流的“送别者”，体现故土记忆的摇摆；三是陷于信仰与现实夹缝的“过渡者”，见证宗教秩序的转移；四是游走在语言边界的“双重编码者”，面对母语退场的焦虑。这些叙事母题既体现文化矛盾的具象承载，也揭示儿童身份在社会建构中的多维参与，构成当代影像对边缘经验再书写的重要路径^[2]。

二、四位导演作品的儿童形象解析

(一) 万玛才旦：宗教与伦理之间的童年沉默

万玛才旦的影像语言以克制而精准的叙事与富含民俗细节的镜头调度，构成一种近似田野观察的凝视，儿童在其中承担关键视角。《静静的嘛呢石》里的小喇嘛，对戏曲面具与电视机的好奇并置，形成宗教仪式与现代媒介的短路效应；他的沉默并非缺席，而是对两套意义系统的谨慎试探。童年主体在寺院与家庭之

间频繁穿梭，既学习经卷，又被荧屏吸引，文化社会化呈现出“仪式化实践—感官诱惑—伦理选择”的连环结构^[3]。到了《气球》，孩童把避孕套当作玩具，天真的举动触动家庭伦理与生殖观念，一举揭开现代制度与宗教教义的潜在碰撞。与其说孩子“无知”，不如说影像在借他们尚未定型的价值判断，显影成人世界的伦理犹疑。万玛才旦并未把儿童推向强烈情绪，而以节制的镜头与稀薄对白，让“沉默”成为最有力的陈述：童年在宗教与世俗之间试错、徘徊，最终构成一种可被观察的伦理实验场^[4]。此处的“纯真”并不止于童趣，更是一种尚未被单一规范束缚的感知能力，用以检验传统能否在现代语境中继续自我阐释。

（二）松太加：自然空间中的孤独成长

松太加擅长把自然景观转化为文化语法。《河》以及《阿拉姜色》中的儿童形象，总与辽阔草地、干冷河谷、风声与动物呼吸相连。孩子的孤独并非心理缺失，更像一门生态课程：在稀薄人口密度与长距离迁徙的生活方式中，个体与地景建立一种近乎身体—地理同构的关系。镜头反复安置儿童于阔景深与长镜头之中，人的身形被景观吞吐，主位与背景互换，童年的存在感由此被自然边框校准。教育、亲情、劳作三者在这里并不对立，孩子一边放牧，一边吸收地方性知识，同时又被学校体制召唤；两套时间制度——自然节律与课堂铃声——在他（她）身上相遇，产生无声摩擦^[5]。松太加通过孤独的面貌和稀少对白，促使观众在地理事实与伦理选择之间重新建构理解路径。童年的成长因此具有人类生态学色彩：环境限制与文化传承共同塑形，个体在风与河的教育中获得韧性，也在制度与亲缘的拉扯中学习克制。

（三）王丽娜：家庭伦理与社会现实的交叉书写

《第一次的离别》把叙事重心落在日常：照料、就学、离散与再见。维吾尔族儿童的“纯真”并不蜷缩在童话框架，而在家庭劳动与学校秩序之间被具体化。影片中，孩子既要承担家务与照护，又要面对语言与课程的双重压力；家国叙事退居背景，家庭伦理与同伴情谊反而获得面相丰富的前景。王丽娜的镜头紧贴乡村生活细部，棉田、羊群、尘土与黄昏构成可触摸的时间质感，孩子的选择与情绪在这些材料上留下清晰纹路。离别的主题贯穿全片，但并未浪漫化——它更像一种结构性经验：教育流动与劳务流动改变家庭组织方式，儿童在情感上追问“何为家”，在实践层面学习“如何做家人”^[6]。此处的童年写作，带出伦理与制度的交叉口：亲属义务如何与学校纪律对话，母语情感如何与主流语言共存。影片不靠说教推进，而以克制的观察与温润的叙述，呈现儿童在现实重负中的柔韧与清澈，进而让“纯真”指向一种日常伦理的自我修复能力。

三、从孩童视角审视传统的转变

（一）家庭结构的转变与权威的崩解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儿童往往身处“非稳态家庭”结构。由于外出务工与城市迁移的常态化，原有的稳定性亲属网络被迫重组，祖辈、亲戚乃至邻里成为临时的抚养主体，形成流动性强、边界模糊的“代理监护”格局。以《第一次的离别》为例，

孩子日复一日地穿梭于照顾病弟与学校考勤之间，不断在责任与成长之间被推挤。相似地，《气球》以避孕问题为切口，揭示长辈、父母与子女之间在价值观与生育伦理上的分歧^[7]。家长权威不再源自父权一体，而是被经济资源、教育背景与宗教意见重新分配。儿童在多重力量的交汇中获得某种“低声权”，他们的沉默、拒绝或微弱参与都能在关键决策中留下痕迹。这一变迁让传统家庭结构不再是权威命令的单向传递场域，而成为多元身份之间的动态协商平台，儿童在其中既被推向边缘，也意外获得参与空间。

（二）教育制度与语言秩序的变迁

学校系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度介入，带来了语言生态的显著重构。普通话作为国家主导的教育语言，迅速占领了公共交流与知识传授的主导地位，而少数民族语言则被压缩至家庭与亲缘网络之中，逐渐边缘化。在多数影片中，儿童常常扮演“中介者”角色，为不识字或不通普通话的亲代读文件、解释制度、沟通外部社会。他们的口音、用词甚至沉默，本质上是双重认同的博弈场。教育制度的普及固然带来信息获取与上升路径，但同时也改变了母语的使用频率与意义归属。文化归属感从族群血缘滑向制度归档，童年的语言选择，已不仅是语感问题，更是身份形塑的内在策略^[8]。

（三）儿童身体的象征性——文化与现代制度的冲突载体

银幕中的少数民族儿童，往往以身体姿态承载多重文化符号。他们的服饰、行动轨迹与身体姿态构成影像语义的深层结构。剃度的小僧人代表宗教身份的入门与驯化，放牧途中奔跑的少年则体现出身体与自然的共谋关系；而身着统一校服、列队升旗的儿童群体，已显露出国家教育机制的规训逻辑。《气球》中男孩握住父亲避孕套时的天真，不仅触发伦理与禁忌的连锁反应，更突显身体作为知识空白与欲望投影的双重属性。当仪式化身体、劳作型身体与纪律化身体在同一儿童身上重叠交错，童年的身体性便不再是纯粹自然的呈现，而是一块不断被编码、擦写与重塑的社会文本。儿童并非受制于他者的“符号”，他们的回望、逃避与沉默动作，亦可视作微弱反抗与自主建构的线索，凸显影像中身体政治的边缘张力^[9]。

四、少数民族文化的未来图景与影像责任

（一）民族文化通过儿童形象走向再生

儿童形象可被设计为文化再生产的发动机，而非被动展示。策略要点在于把“学会—实践—再讲述”嵌入叙事链条：在情节中安放可复现的日常技艺与微仪式（谚语、歌谣、季节性劳作），让孩子以做与说重新点亮知识的使用场景；在对白与场面调度中引入双语对等字幕与口述史片段，使母语与国家通用语言形成互译结构；在选角与训练环节倾向在地化，用家庭与村社作为拍摄共同体，保留即兴表达，鼓励儿童以“讲述者—见证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影片发行后设置回访放映与工作坊，促成社区内的二次讲述与青年创作，从“被看见”转向“会表达”。当这一闭环形成，童真不再停留于情感抚慰，而成为可复制的文化方法，推动

传统在新媒介生态中获得持续生命。

(二) 导演视角与民族自述权的博弈

自述权关涉谁来叙述、如何叙述以及谁拥有最终解释。更可行的路径是建立“内视—外视”的双轨机制：由少数民族创作者主导叙事骨架，外来团队提供技术与资源，影像权属与署名明确共创；在前期调研设立社区顾问与语言校订岗位，重要情节在在地会议中讨论，形成书面纪要，进入剪辑决策依据；中后期引入“反馈放映”，社区对初剪提出修改要点，导演对变动处给出说明，兼顾作者性与群体感。儿童戏份需特别审视，避免把成长作为预设答案，而以情境与关系推动角色行动。此种制度化协商可降低他者化表述，也能提升影像的知识含量，使影片既保留作者的美学锋芒，又把叙述权稳固地放回社区语境^[10]。

(三) 跨文化语境下的儿童影像伦理

伦理治理应前置、可追溯、可执行。拍摄前完成监护人及儿童的知情同意，文字版本采用双语，明确镜头用途、二次传播与撤回权；现场设定“儿童保护官”，对风险场景进行即时评估，涉及疾病、丧亲与宗教禁忌的段落采用“创伤知情”拍摄原则，减少重复再现与逼问；对贫困、苦难与异域风情保持克制，避免

制造感官奇观，必要时使用避脸、改声与时空错位处理，减少对当事人未来生活的潜在伤害；出版发行建立收益与回馈机制，把教育奖学金、社区影像设备与培训列入预算；跨境传播时提供情境化注释与术语表，防止语义漂移。以此搭建从许可到后续治理的全链条规程，儿童不再只是镜头中的“符号对象”，而是在制度护栏内的具名公民，其尊严与文化权益得以落地。

五、结语

孩童形象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中所承载的，不只是纯真与成长的叙事意涵，更成为文化转型、制度规训与身份重塑的综合性显影介质。从宗教缺席到语言滑移，从家庭结构重构到自然空间消解，儿童经验的多重张力揭示了边缘社会的核心困境。导演们以克制而精准的影像语言，使儿童成为情感与制度之间的中介者，也使传统文化在微观层面得以观测其变异路径。未来的研究与影像创作，应持续深化儿童视角的文化能动性，并推动影像生产机制中自述权的制度化建设，以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代语境中获得可持续的讲述与认知。

参考文献

- [1] 阿利,刘洋.近年来中国西部儿童题材电影创作观察与美学探讨 [J].视听理论与实践,2025(1):12-18.
- [2] 黄诗雨.云南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电影的叙事表达研究 [J].电影文学,2023(15):45-51.
- [3] 陈秀芳.蒙古族儿童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 [J].当代电影,2020(4):120-125.
- [4] 李静.藏族题材儿童电影中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 [J].民族艺术研究,2022,35(2):88-95.
- [5] 王静.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中的地域空间与文化表达 [J].电影艺术,2021(6):134-140.
- [6] 郭培筠.新世纪以来蒙古族儿童电影的美学特征 [J].内蒙古艺术,2020,23(1):56-61.
- [7] 肖扬.儿童公路电影《藏巴拉》聚焦心灵救赎 [J].电影评论,2025(10):77-80.
- [8] 刘洋.中国西部儿童电影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 [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4(3):102-108.
- [9] 张忠.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中的成长叙事研究 [J].当代文坛,2023,45(5):156-161.
- [10] 吴丽.云南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的文化传承功能 [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22,29(4):78-84.